

徐匯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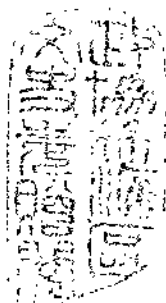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專輯 第六輯

上海市徐匯區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徐汇文史资料选辑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专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一年六月

序 言

胡蔚英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七十年的历史进程，这是曲折的七十年、胜利的七十年。

抚今追昔，我们深切感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凡是巩固了工农联盟，紧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奋斗，革命就蓬勃发展，革命就胜利前进。反之，革命就会遭受挫折，革命就会陷入失败。从中，我们终于悟出了一条真理：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重要的法宝之一。

今天，在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光辉历程之后，我们又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深切地感受到：在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中，仍然要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亲密团结的基础上，调动千军万马，联合最广大的同盟军，组织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四十年的历史一再证明：我们团结的朋友愈广泛，团结得愈紧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愈兴旺发达；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遇到曲折，因而，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乃至二十一世纪的初期，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中，我们的统一战线，肩负着维

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任；肩负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任；肩负着继续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重任；肩负着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建设和改革中作用的重任；肩负着团结海内外同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任。因而，统一战线在今后仍是大有可为，前程远大。

为了进一步发扬光大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时值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谨向读者奉献这本书。此书的诸位作者，以亲身感受，满怀深情地缅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光辉事迹，抒发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热爱之情。它启示我们：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目 录

序言	胡蔚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历史形成的	董涤尘	1
记忆中的几位共产党员的印象和党的教诲	赵宪初	9
我见到了周副主席	朱家泽	13
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前进	干叔涵	16
在党的统一战线培育下不断成长	陈冰清	21
陶行知秉烛畅谈《新大学》	朱家泽	25
跟着老一辈的足迹前进	农工区委	30
一席话的启迪	沈 莹	36
肝胆相照 革命情谊深	江 靖	39
合作共事的点滴体会	沈振家	41
党的忠诚战士王绍鏊	王佩蓉口述	43
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共产党员	袁 铿	47
山城风雨	吴曙天	52
连云港脱险记	叶扬风	61
黎明前的粹光小学地下党	王惠芳	65
我积极投入学运洪流	潘佩华	68
我参加民主建国会前后	高洵侯	72
党的民主政治给我的难忘感受	沈雄霖	76
共产党指引我走社会主义道路	李道发	78
访南国社原址	蒋正楠	81
地下党在我区的两处秘密电台	思源、蒋正楠	83
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吴春龙	8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是历史形成的

董涤尘

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我们怀着无限崇敬和激动的心情来纪念这个光辉节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就与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周旋，机智地，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视线，而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对强大的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进行了二十八年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牺牲了数以千万计的革命烈士，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作为自己这块国土的主人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至今天正在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同样是中国这块土地，同样是炎黄子孙（只是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为什么短短几十年时间，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要完整、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非我力所能及。我这里想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问题，谈一点粗浅认识。

参加民主党派的成员，一般都知道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组成部分，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谈谈个人体会。

我于1920年在商务印书馆辞源总编辑陆尔奎先生资助下，到上海大同大学读书，当时与二哥董亦湘（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苏联牺牲）同住，我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与他一起学习革命的书籍。二哥常与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如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俞秀松、张秋人等接触，在商务印书馆常和杨贤仁、沈雁冰、陈云等同志来往，张闻天同志也来过我家。有一次，我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张国焘来我家，二哥对我说：“你有什么不懂之处，问他好了”。张国焘就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至于我向俞秀松请教，那就更多一些。我们同陈云同志比较熟悉，我和二哥住闸北天通庵路源源里八号，陈云同志住在相近的一幢房子里，到每星期六下午，我常跟二哥去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看陈云同志，我在这些早期的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早在1922年“五一”节，董亦湘、沈雁冰，上海印刷总工会负责人徐梅坤在北四川路尚贤堂对面空地上，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各界人士纷纷参加。

1923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委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沈雁冰任委员长，董亦湘为委员，以促进与国民党的合作，并发动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参加革命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二哥领导党员和职工，积极参加了斗争，组织宣传队到马路上去演讲。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和上海市总工会，联合各界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召集群众大会，发动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反击帝国主义，提出惩凶、废除治外法权、赔

偿等 17 条反帝交涉条件。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广大群众相继举行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形成全国规模反帝斗争高潮，震撼了世界。同年 8 月商务印书馆四千多职工，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大罢工，二哥组织发动，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这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也是得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当时除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致公党外，其他民主党派还未建立。民主人士、社会贤达都是以个人或团体领袖名义参加了斗争。

我个人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一般社会贤达，虽有救国救民之心，但对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多少认识，更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造谣惑众，而心有疑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经验，总是“事实胜于雄辩”，逐渐提高了对党的认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大举入侵我国东北，东北军遵照蒋介石指令，不予抵抗，使日本侵略军不战而侵占了我东北大片国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抗日救国。上海大、中、小学生抗日罢课，八十多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举行联合大示威，要求蒋介石抗日，遭到蒋政府的屠杀。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更是我们现在七十岁以上的上海老年人记忆犹新的。当时驻守上海的爱国将领蔡廷锴率领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得到上海人民积极支持，使日本侵略者遭到重大伤亡，而四易统帅。由于受到蒋介石的反对十九路军不得不停止抗击。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发表“对日抗战通电”，接着又发出反对国民党与日本签订的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的通知。而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主张

抗日的工农红军全力围剿，对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军，则步步退让。同时，对社会上著名的爱国人士，如杨杏佛、史量才等，切齿痛恨，不惜用卑鄙手段，予以杀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1935年，国难愈深，民族益危，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体同胞，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响应，纷纷建立救国会开展救亡运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1936年1月28日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上正式成立。4月28日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推动全国人民组成联合战线。同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大会推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孙晓村等40余人作为执行委员，会议通过《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全国联合战线形成，使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更加波澜壮阔。

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派出一部分士兵去东北，与东北的义勇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殊死的搏斗。而蒋介石则仍然一意孤行、倒行逆施，为了迎合日本侵占我整个华北的野心，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并与日本秘密订立《华北防共协定》，妄图把我整个华北拱手送给日本。这就更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即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当时年已九十五岁高龄的著名爱国老

人马相伯先生等二百八十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压制。接着国民党却又在上海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即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直至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联合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立即应张、杨两将军电请，派周恩来等同志去西安，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许多社会贤达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考虑的。

一九三七年发生“七·七”事变，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通电指出华北危机，号召全民族抗战，并与蒋介石国民党又经过几次交涉，终于迫使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时国民党当局才开始释放政治犯，沈钧儒等七人被保释出狱。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更加激烈。

八年抗战时期，只有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勇于和善于抗击日本侵略者，使日军遭受重大伤亡。在日军后方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宁愿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而尽一切可能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所以深受人民的爱戴。真正是“军民鱼水情”。不少外国记者，亦都有许多真实报道。而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除一些爱国将领打了几次硬仗外，(如淞沪保卫战、台儿庄战役等)，其军政要员从南京、上海政退以后，一路逃定。当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时，蒋介石早已逃至武汉，继而又迁都重庆，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当国民党军队在长沙附近逃跑时，又纵火焚烧长沙，造成“长沙大火案”。如此等

等，举不胜举。蒋介石抗日是消极的，但反共却是积极的，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使八路军、新四军遭到不应有的惨重损失和艰难处境。但八路军、新四军仍对日军伺机出击，从未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予以揭露和批评斗争，但仍然是有理有利有节，尽一切可能使其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许多民主人士配合抗日战争，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对抗战情况作了大量的符合实际的报道。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许多民主人士懂得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得民心的。而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民主人士有困难时，总是关怀备至，尽一切可能予以帮助。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为了更有效地向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在党的关怀下，便先后自觉地成立了各自的民主党派组织。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因经过多年战乱，普遍要求和平、民主，蒋介石为了掩人耳目，假惺惺地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实现人民的愿望和使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便派毛泽东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等陪同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签订了有利于和平的《双十协定》。在此期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分别接见和拜访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著名人士，做了大量统战工作。接着我们党又推动召开了有民主党派和各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议案。

国民党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而被迫接受了协议。重庆各界人士在校场口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时，国民党指使特务人员进行捣毁，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制造

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中的各项民主原则，并通过了各项反共决议。1946年六月，上海十万群众举行反内战、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大示威，选出马叙伦等十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遭到南京国民党特务殴打，即“下关事件”。在重庆，国民党指使特务，先后暗杀昆明民主同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政协决议，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于蒋介石国民党背信弃义，一意孤行，要消灭共产党，坚决与人民为敌，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了。

从抗战胜利到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作出了牺牲，看清了反动派的本质，认识到要和国民党反动派作长期斗争，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的组织，有所发展，有的重新组建。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发展，民主党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编辑和发行了一些进步刊物，如《民革》、《周报》、《民主》等等，受到读者的欢迎。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先后到达解放区，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庄严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等亲切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著名人士，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为开好这次大会，做好充分的、周密的准备工作，这时新中国成立前，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达到了高潮。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通过了国旗、国歌及国都所在

地的决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在共同反对三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是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长期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而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作者原任民进区委主委先后担任过徐汇区副区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记忆中的几位共产党员的印象

和党的教诲

赵宪初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七十年了。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国家欣欣向荣，人民自由幸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经历过新旧两种社会制度。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特将我本人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教诲，就记忆所及，略述点滴，以资庆祝。

恽代英的讲演：

1922年，我在交通大学附中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交大学生会请来了三位名人来校演讲。我亦前往听讲。演讲者三人，二位是国民党员，一位是共产党员恽代英。当时上海还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国共两党还在合作。三位名人讲的都是革命的道理。恽代英最后讲滴，他激昂慷慨，讲述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和青年学生的责任，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声容姿态，非常动人，至今所宣讲之内容虽已淡漠，但印象却至今不忘。

高尔松、高尔柏雇人力车却不坐车：

在交通大学附中读书的时候，知道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两人，同学传说他俩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有一个特点流传颇广，

那就是雇人力车而不坐车上。那时每逢学期开学和放假，同学们都要雇人力车(当时称为黄包车)载运行李，同时人也坐在车上。但高氏兄弟雇人力车只载行李，本人不坐车上，而是随车行走。他们说，坐在车上而由车夫拖你行路，是不合理和不人道的。

陆定一与五卅运动：

陆定一也是在交大读书的，他比我高两班，是1926年毕业的。1925年爆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时，他也在交大领导声援活动，出外游行，他是带头人，晚上在大礼堂开会，他是主持人之一，高声演讲，讲至烈士牺牲时声泪俱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在学生运动中不是积极分子，所以虽认识陆定一同志，但并无交往。

以上四位是我在解放前所知道的共产党员。以下说一点解放后的事。

人民解放军露宿街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家住在徐家汇，有一天早上，听邻居说解放军已到上海了，就在交通大学门前。我们闻讯走到交通大学。果然一批解放军就在交通大学对门的校外宿舍，或卧或坐，并不进入百姓家庭。纪律严明，态度和蔼。我们老百姓从来是怕兵的，称为“丘八”。但人民解放军如此严明的军纪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可敬的，的确他们是人民自己的军队。

陈毅市长的报告：

上海解放后二三天，陈毅市长在交通大学做报告。我们学校几个负责人，也由进步的同学转来入场券前往听讲。陈毅市长的报告长达三四小时，历述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经过和中国共产党对上海的政策。他做报告精神充沛，诚恳动人。这是我听见共产党首长的第一个报告。

学校的接管：

我当时已在南洋模范中学工作多年，担任的职务是教务主任。我们是私立学校，原来执行的当然是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方针。我们当时很担心共产党来接管后，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撤掉。但后来上海市文教局长戴白韬只召开了一个各校负责人的会议，在会上宣布说：今天就接管了。你们除了去掉国民党的党义公民课和童子军课以外，其余课程，暂时一律照旧。事后介绍了两位政治教师来校教政治课，并由文教局的视导随时来校指导外，人事方面，基本上都没有更动。

参加土改：

1951年冬季，教育局副局长杭苇同志召集一次会议，指名我和另一位教师分两批参加皖北土改。他在会上讲清楚，一切工作是有领导的，你们不要怕不懂，说得明白一点，让你们去是要你们接近贫下中农，改变思想感情，去吃吃苦，见见世面。贫下中农是身上有虱子的，他们和你们一起时，不要避开。我们那时的领队是段力佩同志，他是地下党员。到达皖北后，土改总队长是艾思奇。我参加土改两个月，确实是见了世面，皖北的农民生活十分贫苦，即使是富裕中农，也要外出半年讨饭，和我们江南的农村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参加社会活动：

我于1955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随后在1956年参加徐汇区政协。当时民主党派和政协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学习和改造思想，不象现在这样的讲参政议政，因为你要参政议政，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我们这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阶级烙印是很深的。若不改造思想，那你的立场观点都不正确，如何谈得上参政议政呢？所以我认为当时的学习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

四十年来，历经风风雨雨，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对新中国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深信不疑的。

（作者现任市政协副主席、南模中学名誉校长）